

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

(第十三、十四辑)下

宋代文化研究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中心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宋代文化

研究

(第十三、十四辑) 下

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中心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 静

责任校对:张振刚

封面设计:丁 丁

责任印制:杨丽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文化研究. 第十三、十四辑 /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中心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
社, 2005.9

(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

ISBN 7-5614-3246-1

I. 宋... II. ①四... ②四... III. 文化史—研究—
中国—宋代 IV. K244.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7833 号

书名 宋代文化研究 (第十三、十四辑) (上、下册)

作 者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编
	, 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中心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0 mm×202 mm
印 张	26.375(上、下册)
字 数	61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2 500 册
定 价	60.0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目 錄

《左傳》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	徐中舒 (1)
《全宋文》序	繆 鉞 (35)
《文心雕龍》研究中值得商榷的幾個問題	楊明照 (40)
譙定、張栻與朱熹的學術關係	胡昭曦 (85)
《集韻》的版本和整理	趙振鐸 (112)
奉陽君考	繆文遠 (124)
論《全宋文》	曾棗莊 (136)
論東晉南北朝道教的變革與發展	劉 琳 (159)
蘇詩舊注補正 (七)	馬德富 (196)
敦煌本俄 Φ242《文選》寫卷校證	羅國威 (210)
司馬相如作品的新解讀與定位	
——必須提升司馬相如的文學地位	劉文剛 (257)
王安石的文字訓詁學	
——北宋新學學派之個案研究	李文澤 (276)
論兩宋御史臺之建置及其特色	刁忠民 (290)
《明儒學案》點校說明	郭 齊 (322)
宋太宗雍熙北伐綜評	王曉波 (334)

《釋氏疑年錄》宋代部分補考…………… 李國玲 (361)

《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圖書失誤的十五種類型…… 沈治宏 (371)

試論宋朝的羈縻州管理…………… 郭聲波 (386)

《儒藏》編纂之分類體系初探…………… 舒大剛 (397)

漢代災異學說與儒家君道論…………… 楊世文 (423)

吳氏世將與南宋政治…………… 王智勇 (438)

亦僧亦儒更爲人

——釋道璨生平及親情作品初探…………… 黃錦君 (457)

宋詞創作本源研究之一：美人情結…………… 向以鮮 (475)

尤袤詩名及其生卒年解析…………… 吳洪澤 (488)

南宋初州縣省廢及其原因述略…………… 李勇先 (499)

朱熹文集版本源流考…………… 尹波 (517)

標點本《宋史》訂誤…………… 王蓉貴 (539)

中國古代詩學話語言說方式及其意義生成

——《詩經》與中國詩學關係研究…………… 李凱 (552)

以古文爲四六

——歐陽修對宋四六的開創之功…………… 施懿超 (571)

清修省志述略…………… 林平 (595)

《輿地廣記》的地名學價值…………… 王小紅 (608)

錢惟演試論…………… 池澤滋子 (629)

蘇軾詞四首編年考…………… 保刈佳昭 (651)

朝鮮時代文人對蘇東坡詩文的“受容”及其蘇東坡觀

…………… 曹圭百 (666)

王荊公《易解》考略…………… 金生楊 (686)

歐陽修的民族思想及政策述評	楊 然 (705)
古籍電子化問題探析	張尚英 (717)
宋代成都府(益州)路政區沿革考述	李中鋒 (730)
蘇轍“二周說”述評	李冬梅 (754)
三孔文藝思想淺論	李春梅 (763)
論類書的界定	王利偉 (772)
王明清《揮塵錄》考述	霞紹暉 (789)
讀中華書局校點本《宋史·藝文志》札記	李曉珏 (799)
齊地“鄙陋輕義”民風淺論 ——元·于欽《齊乘》“風土篇”讀後	韓麗梅 (810)

建所創業第一年

——回憶二十年前川大古籍所的創業	胡昭曦 (817)
宋代家族研究論著目錄續一	粟品孝 (822)

附：大型項目及成果名稱

《宋人年譜叢刊》	(84)
《中古泥鴻》	(111)
《宋代文化研究》(2~12)	(158)
《朱熹集》(全十冊)	(209)
《諸子集成》系列	(289)
《儒家德治思想探討》	(360)
《黃庭堅全集》(全四冊)	(370)
《中華大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	(437)
網絡版《宋會要輯稿》	(456)
《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宋代卷》	(474)

《全宋文》	(487)
歷代學案	(551)
《儒藏》	(594)
《宋代語言研究》	(628)
《朱熹詩詞編年箋注》(上、下冊)	(665)
《唐宋文學研究》	(685)
《中國地方志宋代人物資料索引》	(704)
《宋僧錄》(上、下冊)	(762)
《三蘇全書》	(788)
《宋集珍本叢刊》	(798)
入宋傳法譯經僧法賢爲法天天息灾二僧考辨	(753)

舒大剛

舒大剛，男，重慶秀山縣人，1959年生於湖北襄樊。1978年考入四川南充師範學院歷史系，1982年畢業後留校任教。1983至1984年，參加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修班學習，結業後回校任助教、講師。1988年做吉林大學訪問學者，師從金景芳先生治經學。1990年9月考入吉林大學研究生院，成為中國古代史專業“先秦文獻方向”博士研究生。1993年畢業，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同年分配到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先後做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1996年晉升為研究員。並於1995年5月起，擔任古籍所行政職務，歷任副所長、所長，連任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兼古籍所所長。歷史文獻學、專門史專業博士生導師，招收“宋遼金元文獻研究”、“儒學文獻研究”、“中國經學史”碩士、博士研究生。

主要從事宋代文獻、儒學文獻研究，發表論文60餘篇，出版專著10餘種。先後承擔和完成國家重點項目《中華大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240萬字，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教育部省屬重點基地項目《三蘇全書》（820餘萬字，主編之一。語文出版社，2000），與哈佛大學、臺灣地區“中央研究院”合作項目“電子版《宋會要輯稿》”（1400萬字），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

設項目《宋集珍本叢刊》(108冊，綫裝書局，2004)。

目前正在從事2003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孝經學史》、“十五”期間國家“211工程”建設項目《儒學歷代學案》整理與新編以及“儒學文獻研究與《中華儒藏》編纂”等大型工程。

《儒藏》編纂之分類體系初探

儒學是古代中國居於統治地位的學術，在中國古代三大主流思想儒、釋、道中實居首位。但是，儒學的文獻却没有像佛教、道教那樣得到系統整理，儒學不僅沒有像佛、道二教有《大藏經》和《道藏》那樣，擁有一部自己的《儒藏》，而且也沒有像佛學文獻和道教文獻那樣，有系統的著錄體系。明朝萬曆時期，孫羽侯、曹學佺先後曾有編纂《儒藏》的倡議和舉措，皆因明朝的滅亡而無功中輟；清乾隆時周永年又撰《儒藏說》重加倡議，曾引起學人極大關注，并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乾隆皇帝下決心編纂《四庫全書》，但是《儒藏》本身因條件不成熟而未能實現。1997年，四川大學曾將《儒藏》列為文科重點項目，1999年又繼續將“儒學文獻研究與《中華儒藏》編纂”立為“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2002年末，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又相繼召開會議，向社會發佈編纂《儒藏》的消息；2003年底，北京大學在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項目投標中勝出，成為“《儒藏》編纂和研究”的組織者和實施者。從此，編纂《儒藏》再次成為從事古代文獻整理和學術研究的學者關注的焦點，報刊、網絡對編纂《儒藏》的宗旨和意義、規模和價值、方式和方法，都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討論，足見學界對編纂《儒藏》工程的熱心參與。

但是，據筆者所知，目前有關《儒藏》問題的討論還局限於“意義”（即重要性）和“方式”（即校點或是影印）的探討，對《儒藏》編纂學上的許多問題還未能深入討論，認識不足。特別是編纂《儒藏》時不可回避的分類原則和著錄體例問題，目前學人採取的只有簡單的取捨態度，還缺乏認真的系統研究。如有的學者主張《儒藏》各書“按作者生卒先後排序”；有的學者主張“採用最能代表儒家學術觀的四部分類法”排列；或又主張“採用‘經、史、子、集、叢’五分法”分類。為何採用這些編排方法，又都沒有進一步說明，似乎這是一個不必討論的問題。

唐代著名史學理論家劉知幾曾說：“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之無例，則是非莫準。”（劉知幾《史通》內篇《序例》）修史如此，編纂《儒藏》這樣大型專業叢書更是如此。筆者以為：舉凡古之大著述、大工程，無不重視體例，講究類目，編纂叢書，也不例外。如果類例不立，系統不建，學統不清，源流無別，叢書將不成其為叢書，學術也達不到彰明之目的。即或是有舊時體例可以因循，省却許多煩惱，但如果因陋就簡，不思更張，必然削足適履，難以完全適應；即或勉強採用，也是他人體例，非我自家風範。故欲成大著述者，必先明其宗旨，思其體例，首建系統，以自成風紀。是故向、歆司籍，九流以別，爰著《別錄》，分立《七略》，使九流百家各有所統，諸子群書自得其歸。唐撰《隋書·經籍志》，清修《四庫總目》，雖然改六分為四部，類目也有很大調整，但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建立類例，以統群籍之功用，實與向、歆父子無別。

北京大學曾宣稱：“《儒藏》編纂工程，字數將超過八億，規模相當於《四庫全書》。”這無疑是一項規模浩大的文化工程！作

爲《儒藏》這樣大型的、專題的也是前無古人的叢書，如果沒有分類，如果無所創新，不僅與如此浩大工程的地位極不相稱，而且也與儒學文獻的具體實際、學人閱讀和使用《儒藏》時的特殊需求極不吻合。因此，只“按作者生卒年代編排”的構想似乎不盡合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需要，似不宜作爲大型叢書（特別是《儒藏》這樣的學術性叢書）的編纂方法。至於“經、史、子、集、叢五分法”，這是在叢書中又列“叢書”，無異《儒藏》中再有“儒藏”，大有疊床架屋、繁複絞繞之感，似亦不妥當。故茲二說，這裏暫且不予討論。那麼，被認爲是“最能代表儒家學術觀的四部”法又如何呢？我們的直觀感覺是：道大難容，缺乏創意。因爲“四部”分類法自魏、晉時期就已經成爲國家圖書的收儲方法和著錄體系，至今已有 1700 多年歷史了，淵源可謂久遠，但它是百科群書、三教九流等綜合性圖書分類體系，儒學當時只屬於其中的一家，今天要編專科型《儒藏》，如何能夠兼備衆體？因此，“四部”分類法雖然已注意到要爲《儒藏》尋找一個“分類體系”，但是找到的并不一定是科學的、合理的體例。因此有待進一步討論的必要。

四川大學自 1997 年以來，即對儒學文獻做過一番調查和分析，在分類問題上也曾有過初步探索。這裏願結合這些摸索，談點個人關於《儒藏》分類方法的體會，以就正於方家。更希望從事文獻目錄和儒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對此問題展開認真討論。

一 論“四部”分類法的形成和適用範圍

誠然，“四部”分類法確是中國古代文獻分類的主要方法，但它不是唯一的方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方法。就像它的形成有一個歷史過程一樣，它的適應對象也有其特定的範圍。“四部”分類法是在中國古代文獻類別不斷增加，同時部分圖書又在日漸減少的情況下逐漸形成的，它是針對中國古代綜合性文獻的狀況（即無所不包，無所不有）而設立的。

中國目錄之學自西漢劉向、劉歆父子創立以來，經歷了許多次演變，其分類有六分、四分、五分、七分、八分、九分、十分、十二分，甚至更多。每次分類的增減，都與當時的圖書實際和學術需要有密切關係。由劉歆在其父《別錄》基礎上刪定成的《七略》，首開中國圖書分類著錄之風。班固“刪其要”而成的《漢書·藝文志》，至今還保留了《七略》分類的梗概：有《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其一篇即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為名”（阮孝緒《七錄序》）。《輯略》即各類小序，因此《七略》實只分為六類，故王充《論衡·對作篇》說：“六略之書，萬三千篇。”第一類《六藝略》即紀儒家經傳諸書，第二類《諸子略》第一子目即是“儒家類”，都是漢代“獨尊儒術”政策在目錄分類領域的表現。自劉歆《七略》、班固《藝文志》，都表現了“儒家獨尊”或“以儒學統衆學”的學術觀，非特“四部”才有。這一分類，在學術上當

然有“考鏡源流，辨章學術”的作用，但也與當時圖書實際和整理時的分工有關係（詳見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卷4）。如兵書、數術、方技實難與諸子嚴格區分，只因當時兵書爲步兵校尉任宏所校，數術爲太史令尹咸所校，方技爲侍醫李柱國所校，故皆別立一個大類，與劉向、劉歆父子領校的經傳、諸子、詩賦之書并列。又如《世本》、《戰國策》、《奏事》、《楚漢春秋》、《太史公》（即《史記》）等皆是史書，實與“六藝”有別，但因當時只有8家、411篇，數量太少，難以自立門戶，故追其淵源，附於《六藝略》“春秋類”下；至於詩賦，如果準此原則追究其淵源，亦係本之《詩經》，却因有106家、1318篇之多，卷帙浩繁，難以寄生，故別立《詩賦》一略。

後世圖書目錄類別之分合，方法至多，要其準則，雖云本之向、歆，實亦因當時文獻狀況之增減而在類目上有所損益。這是歷代圖書分類的通則。如魏晉時期，兵書、數術、方技以及先秦諸子書籍銳減，而歷史、地理類文獻又日益激增，故荀勗的《中經新簿》已不再堅持《七略》的六分法，只將中央藏書分爲四部：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近世諸子、兵書、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隋書·經籍志序》）。甲部當《七略》“六藝略”，乙部則當其“諸子”、“兵書”、“數術”、“方技”四略，丙部即後之“史部”，已從《六藝》中“春秋類”的附庸獨立出來；丁部則當《七略》“詩賦略”。

由於荀勗將中國圖書按四大類分編，有以簡馭繁之效，故歷代書目多所採用，東晉李充又將其乙、丙二部互換位置，將史書提於子部之前，從此之後，“秘閣以爲永制”，著錄奉爲常法。南

朝梁元帝時，又將四部之書各冠以“經、史、子、集”四者之名（顏之推《觀我生賦》自注）。唐修《隋書·經籍志》，以四部分類，用經、史、子、集之名，于是經、史、子、集的四分法遂成為中國百科圖書主要的分類形式。連事事欲超越前人、處處想自立風範的乾隆皇帝也無法更改，由他“欽定”的《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總目》皆採用四分法。

及至 20 世紀 50 年代，上海圖書館在為 2797 種叢書編制子目索引時，其《中國叢書綜錄》第二冊即“以子目為單位，採用四部分類，部下又析為類、屬”的方法編製而成。可見，四部分類法自魏晉朝以下至於近世，都是中國古籍圖書主要的分類方法。

從發展的眼光看，“四部”分類法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十全十美的方法。故荀勗、李充之後，對四分法進行改造者仍不乏其人。南朝宋王儉為公家撰著《元徽書目》，雖用“四部”法，而反映本人學術思想的《七志》，却用七分法：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伎；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另有佛、道二類附於書末，實為九類。如果說其前六志係用劉歆《七略》而略變其名，其第七志乃根據南北朝時期地圖、譜錄增加，故立圖譜志；附錄二志則因其時佛、道二教盛行，經典驟增，故設佛、道兩志。之後，劉孝標和祖暕又有“五部目錄”。南朝阮孝緒因之作《七錄》又創為七分：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謂之內篇。外篇則為佛法錄、仙道

錄。合內外二篇，共爲七部。

唐、宋以後，書籍倍增於前，學術日繁於後，無論從體例上還是從內容上考察，這些書籍都無法用經、史、子、集來包舉了。故宋人編目，多只按“四部”分類法略略將群書歸於相近的部居，而不再總標以經、史、子、集之名。歐陽修等《崇文總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皆是如此。李淑、鄧寅、鄭樵等人，又在“四部”法之外更出新招，淑《邯鄲圖書志》在經、史、子、集之外，更益以藝術志、道書志、書志、畫志，共爲八類；寅《鄧氏書目》在“四部”之外，增加藝錄、方技錄、類錄，共爲七部；鄭樵《通志·藝文略》於經類外，又有禮、樂、小學；諸子類外，有天文、五行、藝術、醫方、類書，加上史類、文類，共十二類。直至清儒，雖然官修《四庫全書》及其《總目》已經“欽定”爲“四部”，但是學人著書仍在繼續探索新的方法，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在史學外，有地理、金石；諸子外，有天文、醫律、類書、書畫；加上經學、小學、詞賦共爲十類。這些探索都更接近群書增損的實際，也更符合日益專深的學科研究之需要。

總結以上所述，目錄分類方法的創立，其原則不外二種，一是便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二是圖書種類和數量的增減。有其書并已達到一定數量，就應爲之立目；無其書（或是雖有而量太少），就沒有必要空存其目。要其總歸，端在於切於實際和合於實用而已。故余嘉錫先生說：“自來言及書目，輒曰經、史、子、集四部。實則自齊、梁以後已嘗數變矣。今之學術，日新月異而歲不同，絕非昔之類例所能賅括。夫四部可變而爲五（祖），爲六（《隋志》），爲七（阮孝緒、許善心、鄭寅），爲八（李淑），

爲九（王儉），爲十（孫星衍），爲十二（鄭樵），今何嘗不可爲數十，以至於百乎？必謂四部之法不可變，甚且欲返之於《七略》，無源而強祖之以爲源，非流而強納之以爲流，甚非所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也！”（余著《目錄學發微》）實可鍼死守“四部”法者之膏肓矣！

吾人談《儒藏》分類，是襲用《七略》，抑或採用“四部”，或是採用其他，首先必須知道，《七略》、“四部”等等都是百科群書的分類方法，並不是爲專題叢書而設的，更不是專爲《儒藏》而設。《漢志》以《六藝略》統六經、小學之書（附錄史部之書）；《諸子略》統儒、道、名、墨、法等九流十家著作；《詩賦略》統賦、詩等作品；《兵書略》統軍事理論及技巧等著作；《數術略》統天文、曆法等著作；《方技略》統醫藥、神仙之書。除《六藝略》（史學著作又除外）、《諸子略》的“儒家”之外，幾乎都不是直接的、真正的儒學文獻。“四部”法也是如此，其《經部》大部（除少量小學著作外）、《子部》“儒家”，尚可以說是儒學著作，其他各部（如《史部》、《集部》）都只有少部分屬於儒學作品（如《史部》“正史類”的儒林傳，“傳記類”的孝子傳、忠臣傳、名儒年譜，“綜錄類”的學案等。至於“紀事本末類”、“別史類”、“史鈔類”、“載記類”、“地理類”并不直言儒學，故留之無益。《集部》實爲雜匯，多半不言儒理，一概存之，亦非良法），因此再一成不變地、完整地保留一個《史部》或《集部》就完全没有必要。由此可見，專題性叢書如果再一味照搬綜合性叢書的分類法，就顯得不倫不類，“道大難容”了。